

立足国学 守望传统

——读《古典文献论丛》

葛 刚 岩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葛刚岩(1971-), 男, 山东青岛人, 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先秦唐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7)01-0127-02

20世纪80年代前后, 赵逵夫先生相继发表了《屈氏先世与句亶王熊伯庸——兼论三闾大夫的职掌》(《文史》第25辑)、《〈战国策·楚策一〉张仪相秦章发微》(《古籍整理与研究》总第6期)等一系列文章, 为屈原研究中的许多难点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和研究思路。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后, 很快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和认可, 也奠定了赵先生在楚辞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著名学者郭在贻先生1988年在给赵先生的信中说:“环顾宇内, 真正老老实实做学问者, 虑不数人, 中年朋辈中, 兄当为其一也。”(《郭在贻文集》第4卷, 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老一辈学者汤炳正、张震铎、魏公昌等也对赵先生所取得的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除楚辞学之外, 赵先生在古代文史的其它领域也倾注了很多心血, 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些研究成果, 不仅解决了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 推动了学术的发展, 其所体现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也对我们有很大启发。这些主要集中在赵先生的专著《古典文献论丛》(中华书局2003年出版)一书中。今就该书的内容及其学术研究特点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全书内容广泛, 共分五部分: 简帛文献研究、敦煌文学文献研究、宋前戏剧研究、诗赋研究、民族史等其它领域研究。

(一)简帛文献研究方面。赵先生以新版《银雀山汉墓竹简》为蓝本, 对其中的《孙臧兵法》重新进行校理, 写成《〈孙臧兵法〉校补》、《〈银雀山汉墓竹简〉原列〈孙臧兵法〉·下编》十五篇校补》两篇文章, 继续补出一些缺文, 缀合了一些断简, 使这部失传2000余年的先秦古书更加趋于完整。1973年, 赵先生根据帛书《相马经》写成《马王堆汉墓帛书〈相马经〉·大光破章故训传》发微》一文, 认为该书内容应分为“经”、“传”和“故训”三部分, 其中“经”文部分当产生于战国中期以前, “传”与“故训”则要迟一些。赵先生的研究, 科学地釐清了这部帛书的组成情况和文字体例, 这对于该书文字的考释、缺文的校补、名词术语的破译, 都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对于我们认识战国末期楚地科技文献的形式、书籍的编注体例也有重要意义。

(二)敦煌文学文献研究方面。敦煌变文、俗赋都是俗文学, 由于传抄者所误, 文献中文字错乱的现象非常普遍, 给人们的识读带来不便, 也降低了其本身的学术价值。赵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 对敦煌变文、俗赋进行了校勘补正, 写成《〈捉季布传文〉校补》、《〈伍子胥变文〉校补拾遗》等五篇文章, 提出了有益的见解, 如《伍子胥变文》中的“北以淮海为关”一句。楚人与海不相接, 楚国之北疆更无海可言, 所以此文有误。赵先生考证认为“海”当作“汉”, 音近而误。《左传·僖四年》:“楚国方城以为城, 汉水以为池。”淮河在楚东北, 汉水中游在楚西北, 俱为北疆防敌之天堑, 故曰“北以淮汉为关”。赵先生所论, “见人之失察, 发人所未悟, 使不可卒读之篇句, 得以文从字顺”。此类校勘, 赵先生在书中录有200余条, 不敢说每条校记都是颠扑不破的定论, 但总体上使敦煌遗书更接近于本来面貌, 利于恢复其应有的学术价值。

(三)宋前戏剧研究方面。赵先生花费十余年之功, 对“巾舞歌诗”《公莫舞》进行了全面研究, 写成《我国最早的歌舞剧〈公莫舞〉演出脚本研究》、《三场歌舞剧〈公莫舞〉与汉武帝时代的社会现实》两篇文章。较之前人的研究, 赵先生的贡献在于: 第一, 从理论上对原辞中的歌辞、复唱以及表演术语、声词、语助词和辅声提示词, 作了明确界定; 第二, 从音乐角度将该戏剧脚本划分为20解; 第三, 考证了歌辞中的“母”、“子”为呼唤语, 从而认定《公莫舞》为代言体; 第四, 根据甘肃

武威磨子嘴出土的汉代漆樽画,为《公莫舞》的产生年代找到了可靠的依据;第五,考证出《公莫舞》的历史背景是汉武帝时马邑设伏与塞瓠子河决口前后事。

(四)诗赋研究方面。本书有关《诗经》的文章收有两篇。赵先生从《诗经》的编排入手,提出两次编成说,首次编集者是召穆公后人,时间在公元前 7 世纪中叶;二次编集是在公元前 6 世纪前期,其中多为周王室守藏史和乐师所保存的诗歌。小、大“雅”之分,正是源于这两次编集,因篇幅太大,故在第二次编入的雅诗卷名前加“大”,在原有部分的卷名前加“小”,以示区别。这种解释不仅更富有说服力,而且打破了以往单从主题思想、诗体风格和音乐三方面探寻缘由的固定思维模式,开启了新的研究思路。有关辞赋的文章共收有三篇,《〈七发〉与枚乘生平新探》中,赵先生认为《七发》广陵观潮一段是枚乘为吴王郎中时所作;补成全篇,则是在刘潭谋反迹象渐为明显之后。《赵壹生平著作考》则在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基础上对赵壹生平履历进行了考证,查明了“袁滂”误作“袁逢”的原因,澄清了汉灵帝接见赵壹的时间及推荐者身分的问题。《汉晋赋管窥》是对汉魏晋时代的八篇辑佚赋文的文献整理。

(五)民族史等其他领域的研究。这部分包括五篇文章,内容上没有统一标准。《〈形天葬首仇池山说〉笺注》是在子贤先生(赵先生之父,名殿举,字子贤)《形天葬首仇池山说》的基础上,恢复了“形天”神话中被历史遗忘的部分,证明形天为雕题氏的祖先,即后来氏人的祖先神。《古代神话与民族史研究》通过对西北地区历史、地理、民俗、神话的全方位考索,认为氏人起源于陇南,是在中华土地上形成的民族,并非来自中亚。这一说法虽未为定论,但至少向传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金瓶梅〉借用〈青琐高议〉材料考》中,赵先生将《金瓶梅》与《青琐高议》进行了细致对勘,发现《金瓶梅》一书取用了《青琐高议》中的材料,至于借用数量、借用方式,赵先生在文章中都有详实的分析论证。

关于该书的特点,安平秋先生已有评价:“这部《古典文献论丛》是近二十年来古典文学、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里的一部注重实证、视野开阔、论证有力、成一家之言的论著。”可谓恰切精到,一语中的。笔者不揣浅陋,总结如下:

第一,将历史观念融入文学研究。先秦文献流传至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古书的编写、成书,以及流传演变情况相当复杂漫长。有些研究者在进行学术研究时,没有考虑,或很少考虑到这些复杂的情况,而简单地按自然科学的法则或考古的办法来断定先秦古书的真伪及产生时代,往往会因为研究方法上的失误而造成许多错误的论断。如对《诗经》的研究,有些人只把它当作“一部书”来研究,而忽视了它的时间跨度以及每个时间段的具体发展情况,“我以为先秦文学的研究首先要体现出时间的进程。《尚书》中包括的文章时间跨度在一千年以上,《诗经》中作品时间跨度按一般说法也在 500 年以上,我们都把它们作一部书来研究,怎能展示漫长的先秦时代各个阶段上文学发展的状况?”(赵逵夫《拭目重观,气象壮阔——论先秦文学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 4 期)赵先生在《论〈诗经〉的编集与〈雅〉诗的分“小”、“大”两部分》中,就是从历史的角度,考虑到古代文献著述、编纂、流传、整理的实际情况,而推考出小、大“雅”的编撰状况、成书时间及划分原因。

第二,重视出土的新材料。材料处理上,赵先生注重从传世文献中寻找新的史料价值,这在他以往的著述中经常可以体会到。同时,赵先生也非常重视出土的新材料,“我专门研究简帛金文的论文不多,但是我的整个研究工作差不多一直同地下出土的文献、地下出土实物、遗址等相关联。”(《前言》)19 世纪以来,武威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等简帛文献相继出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对于《文物》、《考古》、《考古学报》等考古期刊,以及出土文献书籍,赵先生几乎每期每书都要看的,“我们应清醒地意识到:出土文字材料当初埋入地下之后,在内容、形式上除自然力的影响外一般不会有改变(但有时也有例外,如曾经被盗等),而传世文献却一直处于人的操作之中。”在《古典文献论丛》一书中,赵先生直接研究,或涉及出土文献的文章就有十余篇,充分说明赵先生对出土材料的重视程度。

第三,广采博收,在吸纳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自出机杼。熟悉赵先生文章的人都知道,赵先生的文章多以介绍前人研究成果开篇,对诸家之说都了然于心,作到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独到新颖而又令人信服的观点。如《唐勒〈论义御〉校补》一文中,赵先生广泛收集、阅读了罗福颐、汤漳平、谭家健、饶宗颐、(日)稻耕一郎等人的著述和文章,逐一分析其优劣,然后以其深厚的文字、音韵、训诂、文献等小学功底,对简文加以校补,尽可能地恢复其原貌,认为“唐勒”是书名,汉墓中出土的只是该书中的一篇,篇名为《论义御》。